

目前,中日两国国民互相嫌恶的比例不断创出新高,而成因之中,围绕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识占据突出位置。可以说,与其重要性相比,南京大屠杀史目前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深化研究是学术必需,而本文最大的期望是“愚者千虑”。

[作者张生,中国抗日战争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抗战老兵口述调查与抗战研究*

张连红

21世纪以来,抗战史研究无疑成为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其中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调查成为抗战史研究领域一大崭新的风景线。本文不揣冒昧,对目前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调查现状与抗战研究之关系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供方家指正。

抗战老兵口述调查的现状

以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为契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调查,出版了许多抗日官兵的口述资料。主要有:中国文史出版社以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忻口会战、印缅战场、常德衡阳等主题汇编出版的原国民党官兵的口述资料,方军《最后一批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蒋鸿熙《血泪忆衡阳》(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卫我中华——黄埔校友抗日回忆录》(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2005年编印),张成德等编《山西抗战口述史》(全4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组的《寻访抗战老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陈真、田川等编著《寻找英雄——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葛先才《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江苏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连续整理编辑《老兵话当年》(全24册,江苏新闻出版局2008年准印),梅世雄《与鬼子玩命:抗战将士“口述历史”》(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我的抗战》节目组编《我的抗战》(全2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2012年版),方军《最后的军统老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湖南图书馆编《湖南老兵抗战口述录》(全2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方军《最后的尊严——浙江宁波的抗战老兵》(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周渝《卫国岁月:国民革命军抗战将士寻访录》(团结出版社2014年版),方军《最后的川军——老兵口述实录》(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李么傻《老兵口述抗战》(全3册,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张军锋主编《八路军口述史》(上、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李丹阳主编《抗战时期的中国文艺口述实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另外,戈叔亚对中国远征军及滇西战场进行的长期艰苦的调研、张西对延安时代女兵的口述记录、李小江推动的“20世纪(中国)妇女”计划等,均成果斐然。

近10年来寻找、关爱抗战老兵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全国各地媒体几乎都或多或少进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15ZDB045)阶段性成果。

行过相关采访报道,无论是传统的期刊报纸、电视,还是网络和自媒体都积极拍摄、报道寻找抗战老兵,如《南方都市报》《湖北日报》都曾进行专题采访报道老兵口述历史。在全国众多媒体中,以崔永元团队所开展的《我的抗战》影响最大。自2008年以来崔永元拍摄团队采访了500余名抗战老兵,制成32集大型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其主要内容取材于崔永元自筹资金拍摄的“口述历史”采访中的一部分。湖南卫视主持人汪涵及其团队采访了436名湖南抗战老兵。另外,田川导演曾寻找抗战老兵,拍摄纪录片《寻找英雄》(又名《新儿女英雄传》)并在中央电视台等多家电视台播放,产生了广泛影响。2012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组以东北抗联为专题,采访了20名抗联老战士及其子女,整理为口述资料,并在国家图书馆网站上建成数字资源库。

在寻访抗战老兵的过程中,民间团体和志愿者成为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目前规模最大的关爱抗战老兵的民间基金是深圳越众公司董事长应宪于2009年发起成立的龙越关爱抗战老兵基金,2013年改组成立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该基金由深圳市越众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并成为全国性公募基金。截至2016年6月,已有2010名抗战老兵获得助养,助养金额总计发放16216200元;其中673名助养老兵已去世,发放忠孝帛金882000元。该项目总计发放17098200元。越众公司还成立了越众历史影像馆,收录了数万张老兵图片和数百小时录像。这些影像资料由众多民间摄影师、摄像师及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收集而来,记录了老兵当年的抗战经历及目前的生活现状。除越众公司外,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也采访、录音录像527名抗战老兵(其中338名新四军老战士)的口述资料。另外,还有许多民间团体个人、影视明星、大学研究机构也进行了许多访谈调查和关爱老兵的活动。

抗战老兵口述调查的检讨

从我国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调查的现状来看,尽管社会各界十分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生动的口述历史资料。但同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相比,我们所进行的口述历史调查工作仍有许多不足:

首先,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调查的内容不够丰富,数量远远不足。从目前已出版的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资料来看,一是社会各界对抗战老兵抢救调查的投入严重不足,相对于抗战结束时中国500余万官兵来说,接受过口述访谈的老兵所占比例太小,留下的口述史资料太少。二是在已出版的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调查资料中,八路军和新四军老战士的口述回忆资料出版多,而有关国民党抗战老兵的调查偏少。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大潮中,“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国人民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奋起反抗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民族危亡关头,无论是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都是抗日战争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从全民族抗战的视角来进行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资料抢救整理。三是我们以往比较重视高级军官口述历史资料的搜集,而对普通士兵的调查很少。这同口述历史“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并不相符。四是抗战老兵口述历史的内容比较偏重军事抗争,更为关注重大战役、重要战斗等资料的搜集,对抗战时期的军队生活细节则很少涉及,因此,现有的口述历史资料无法反映整个宏大的抗战生活,而这些资料在档案文献中又很难找到,亟须通过口述访问弥补,从而为构建真实全面丰富的抗日战争提供生动鲜活的资料。

其次,在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调查过程中,历史学专业人员参与访谈少,严重制约口述访谈质量。口述史研究不是简单的复原历史,而是与历史对话,是访谈人与受访人的双向互动交流。受访者在讲述历史的时候,可能受到记忆和情绪等因素的影响,口述内容可能出现张冠李戴、前后倒置,以及

片面主观甚至故意颠倒是非等情况,因此,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熊月之认为“访问者要具备良好的历史学素养、广阔的知识面、熟悉从事某一课题的专业训练,通过提问、讨论、串联、整理,使访谈资料得到补充和完善,使访谈质量得以提高”。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访问抗战老兵的专业人员参与太少,访谈者主要是媒体工作者、专业作家和众多志愿者,他们虽然进行了一些抢救性的采访,但许多口述资料缺少专业指导,访谈质量不高,甚至出现许多低级的历史事实错误。而高校和科研院所由于受到非科学的学术评价导向的影响,具备专业能力的专家几乎很少有人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进行口述史的访谈,这是制约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质量的关键问题。

第三,从调查组织上来看,缺少全国统一的专业组织,访谈工作较为分散,未能产生具有一定影响和一定规模的集成性成果。虽然目前有如深圳越众公司关爱抗战老兵基金和崔永元团队进行的大规模抗战老兵访谈,但前者比较注重关爱抗战老兵的生活,后者则较注重电视媒体传播的需要,其访谈方法、目标和视角与历史学意义上的口述史并不相同。少数抗战老兵的口述资料集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一些纪实作家进行的口述史都具有纪实文学性,调查规模也较小。因此,从严格科学意义上来说,目前尚缺少大规模有组织的抗战老兵口述史访谈,现有的调查也没有形成严密科学的体系,没有产生一定规模的集成性成果,无法满足进一步深化抗日战争研究的需要。

抗战老兵口述历史的学术价值

自21世纪以来,抗战老兵的口述史资料在社会各界受到广泛和高度的重视。一方面抗战老兵是抗日战争中重大战役和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们的口述资料是抗日战争研究宝贵的财富,是整个抗战资料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由于处在战争这一特殊时期,许多重要战役和重要事件,都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许多历史出现了档案资料的空白(再加上许多重要的档案尚未开放)。在研究抗战历史时,如果没有抗战口述史资料的补充,可以说很难全面揭示抗战历史的真相。由于我们所拥有资料的局限性,导致抗战历史研究主题比较偏颇、内容比较片面,这“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显然,通过访谈抗战历史的亲历者、知情人,可大大弥补抗战历史资料的不足。抢救整理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资料,有助于形成完整的民族记忆,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可以进一步拓展深化抗战研究领域。各级档案馆和图书馆等部门所藏抗战期间的档案文献资料,大多比较偏重于记录政府主要领导人、社会上层精英的活动,偏重于政治、军事作战决策、军事领袖、重大战役。对于诸如抗战期间尸体掩埋、奖惩抚恤、通讯联络、衣食住行、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武器装备、情报侦察、卫生教育、娱乐生活等问题,由于缺少第一手档案资料,至今其具体细节仍多为历史空白,因此,需要通过进一步挖掘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资料,以弥补第一手档案文献资料的不足。另外,抗战口述史的开展可以激发民众参与抗战史研究的热情,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并产生强烈的社会共鸣。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曾指出:“世纪之交以来,随着大众生活史、社会文化史的盛行,口述史日益发展。而且,录音、录像设备的普及,数码相机推广,为平民大众参与口述活动提供了可能。口述史发掘了大量沉默的人群,让‘事件’的参与者直接与‘历史’对话,将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史学,不仅可以填补文献资料的不足,校正认识偏差,而且越来越使历史展现出有血有肉的‘人’的个性特征。”因此,积极开展抗战老兵口述史调查也拓展了历史学的宣传、教育功能。

从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人类活动无比丰富多样,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下其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特别是历史亲历者个人生活的情感、体验、

感悟和音容笑貌,有时无法用文字载之史册,而这些都是十分鲜活的珍贵历史资料。具有音像录摄等现代多媒体功能的口述历史则可以在这方面弥补传统档案、文献的不足,可以通过影像真实再现亲历者的情绪变化,从而让观众感受到历史的温度,体验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因此,当我们看到抗战老兵诸如致敬或激昂慷慨演讲的画面时,我们心灵深处总能受到强烈的感染和震撼。

当然,我们在充分认识抗战老兵口述历史学术价值的同时,也要注意抗战老兵口述内容的真实性问题。最近几年来,我们也经常看到少数抗战老兵在接受媒体采访或出版口述自传时故意夸大或虚构历史事实。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左玉河认为:“要求受访者所讲的一切都符合‘客观事实’,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受访者有记忆上的局限,更要求访谈者和整理者大胆介入,用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口述史料,纠正受访者记忆的失误。”这就要求我们访谈者具有专业知识背景,能对访谈内容进行考证纠错,同时,我们在发表、出版和利用抗战老兵口述资料时也要进行学术考证。

[作者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马晓娟)

抗日战争研究的新史料与新视角

陈谦平

去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明年是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抗日战争相关问题已成为近几年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研究热点。抗日战争史研究应该如何进一步深入?过往的研究中还存在哪些不足?在这一方面还应该开辟哪些新的研究领域?采取哪些新的研究方法?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思考与总结。

回顾以往的研究,笔者觉得,研究视角的宏大和多元更加重要。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使得中国战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我们应该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层面来认识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基于这样的视角,中国抗日战争对于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正能量便能得到极大体现。日本在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是要实现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称霸的目标。而中国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局部抗战和七七事变爆发后的全面抗战,均有力遏制了日本速战速决、迫使中国投降的战略企图,使得日本在亚太地区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受到延阻。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中国各党派和各民族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浴血抗击日本侵略军。这样的认识,是从事抗日战争研究者必须把握的基本立场。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摆脱过去影响抗战史研究深入的诸多困扰。我们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纠缠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之争,或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加以对立,这些都无益于阐明中国抗日战争之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

基于上述认识,全面、系统地研究抗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尽管学界对于这一时期的中美、中苏、中英关系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缺乏更高层面的系统研究。尤其对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为同盟国成员的中、美、英、苏的相互关系,还有中国战场同美国亚太战场乃至欧洲战场的关联等等,至今没有从国际战略层面加以考察。